

◆國史大綱(上)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錢穆 著



27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◆ 國史大綱（上）

聯經



A89015

錢賓四先生全集 ⑦

國史大綱（上）

錢 穆 著



出版說明

民國二十二年秋，錢賓四先生在北京大學開授中國通史課程。其前此課由校方分延北平史學斷代專家凡十餘人，輪流作專題講演；至是改而公推先生一人獨任講授。當時爲配合每週四小時課程之安排，其講授務求本諸客觀史實，對歷代之文治武功、制度經濟，皆能提綱挈領，兼羅並包，而尤要則著眼於全部國史之上下相關處，求其成一大體。第二年並就每講編一綱要；又別就所講須深入討論之問題，自二十四史、三通等古籍，選錄原文，纂爲參考材料，俾聽者自加參研。綱要編至東漢止，自嫌太簡，遂未續編。而參考材料亦下迄唐五代止，由北京大學講義部印行，專供北大學生之用。

二十六年七月，蘆溝橋事變，先生避難南下，轉香港，至湖南，隨北大加入當時與清華、南開合組之長沙臨時大學。二十七年年初，學校遷昆明，命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。而文學院則轉遷蒙

自，先生隨往任教。

先生在北大講授通史，先後凡四年；後在西南聯大，續講兩年。每年所講內容皆有所增損，然其大宗旨則始終不變。其在聯大，同事陳夢家教授嘗兩度力勸先生，宜應時代之迫切需要，即爲中國通史寫一教科書，俾可使全國青年受益。先生納其議，遂決意撰寫國史大綱一書。此本書撰著之最先因緣也。

二十七年秋，聯大文學院由蒙自遷返昆明，先生以昆明煩囂，不宜著述，故除半週任課外，其餘半週則卜居宜良。因友人之介，得獨自借居宜良縣長座落城外西山岩泉下寺之別墅，不接人事，專意撰著。先生自在北大講授通史，每堂先一日必寫錄所需史料，累積得五六厚冊；至流遷南嶽、蒙自，又續有添寫。此則先生在宜良山中撰寫史綱所憑之惟一祖本也。

先生之撰是書，其先就北大所編綱要，自魏晉以下續編之。及初稿既成，復嫌其東漢以前舊稿文例詳略未盡相協，因又重加改寫。依先生自記，自二十七年五月十日，至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，先後凡十三月而書成。全書計凡八編，四十六章，約五十餘萬言。稿既成，以其時昆明屢遭空襲，急欲付印，乃於二十八年暑假赴香港交商務印書館出版。商務雖已遷港，惟仍須交回上海舊廠付排。先生昔就讀常州府中學堂之業師呂思勉先生，時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；先生因拜託呂

先生代作最後一校。呂先生既校讀是書，特盛讚其中論南北經濟一節，又謂：「書中敘魏晉屯田以下，迄唐之租庸調，其間演變，古今治史者無一人詳道其所以然。此書所論誠千載隻眼也。」

然是書之印行，復遇曲折。蓋當時規定，書籍出版須先經中央某處審查；上海遂將書稿送重慶審查。批示謂需改「洪楊之亂」爲「太平天國」；章中多條亦須重加改定後，呈請再審。稍後先生始知其事，乃作答云：「孫中山先生以得聞洪楊故事，遂有志革命，此由中山先生親言之。但中山先生排除滿清政府，創建中華民國，始是一項正式的民族革命。至於洪楊起事，尊耶穌爲天兄，洪秀全自居爲天弟，創建政府稱爲太平天國；又所至焚燬孔子廟；此斷與民族革命不同。前後兩事絕不當相提並論。凡本書指示需改定語，可由審查處逕加改定。原著作人當保存原稿，俟抗戰事定，再公之國人，以待國人之公評。」審查處得先生函，乃改批示可一照原稿印行。然亦因之延遲半年，故其初版面世，則已至二十九年之六月矣。

是書卷首有引論一篇，凡兩萬言，揭發全書之精神宗旨與撰著方法。先生於稿成後，先披載之報端，一時議者闐然。及其書出，學者交相稱譽，群推爲中國通史之最佳著作；而議者遂寢。然是書出版後，僅最先一批數百本得經海運河內，轉運後方。此後海運即斷，不得再送。於是改在重慶以國難版發行。當時有人購得滬初版攜返北平，知者乃有輾轉借來整書傳鈔者。其對學界

先生代作最後一校。呂先生既校讀是書，特盛讚其中論南北經濟一節，又謂：「書中敘魏晉屯田以下，迄唐之租庸調，其間演變，古今治史者無一人詳道其所以然。此書所論誠千載隻眼也。」

然是書之印行，復遇曲折。蓋當時規定，書籍出版須先經中央某處審查；上海遂將書稿送重慶審查。批示謂需改「洪楊之亂」爲「太平天國」；章中多條亦須重加改定後，呈請再審。稍後先生始知其事，乃作答云：「孫中山先生以得聞洪楊故事，遂有志革命，此由中山先生親言之。但中山先生排除滿清政府，創建中華民國，始是一項正式的民族革命。至於洪楊起事，尊耶穌爲天兄，洪秀全自居爲天弟，創建政府稱爲太平天國；又所至焚燬孔子廟；此斷與民族革命不同。前後兩事絕不當相提並論。凡本書指示需改定語，可由審查處逕加改定。原著作人當保存原稿，俟抗戰事定，再公之國人，以待國人之公評。」審查處得先生函，乃改批示可一照原稿印行。然亦因之延遲半年，故其初版面世，則已至二十九年之六月矣。

是書卷首有引論一篇，凡兩萬言，揭發全書之精神宗旨與撰著方法。先生於稿成後，先披載之報端，一時議者闐然。及其書出，學者交相稱譽，群推爲中國通史之最佳著作；而議者遂寢。然是書出版後，僅最先一批數百本得經海運河內，轉運後方。此後海運即斷，不得再送。於是改在重慶以國難版發行。當時有人購得滬初版攜返北平，知者乃有輾轉借來整書傳鈔者。其對學界

本書自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滬初版以還，版行無數。本會亦未能盡搜，所得而知者，計有三十二年八月成都蓉一版、三十三年一月重慶一版、三十六年五月滬一版、三十七年八月滬五版、四十一年九月臺一版、四十四年港特版、四十九年臺七版、六十三年九月臺修訂一版、八十年四月臺修訂十七版等。六十二年修訂時曾改訂第一編第一章考古部分；同時由王恢教授代繪助讀地圖，增入凡二十八幅。

先生生前嘗謂本書當與其中中國文化史導論合讀，庶可對我國歷史之全體有更深入之認識，但惜其文化史未如史綱之爲社會所注意，常以爲憾。民國八十年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決定出版先生全集，編委會因提前整理此兩種，並於八十二年先交臺北商務印書館，據此最新整理者改版印行修訂二版。翌年，北京商務印書館亦同時重印此兩書之新修訂本，以爲先生百年誕辰之紀念。

又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，臺北東昇文化事業公司印行中國通史參考材料一書，即先生在北大通史課所編發學生之參讀材料。先生以原編材料未完，且其後屢有增改，而其要義亦已寫入國史大綱之中，因不主再將初編材料重印。故今編全集，乃承先生遺命，不再收入此編。

本書之整理，乃以民國六十三年臺北商務修訂本爲底本，參考其前各本，正其綱目、注文之錯系；原書引文起訖多無標示，今悉予補入引號；其引文亦儘量複查校覈。各版除雙行夾注用小

字外，其餘字體一例無別；今則綱目別排較大字體，務求眉目清楚，更便讀者閱讀。本書內容繁富，關涉甚廣，整理工作雖力求慎重，惟錯誤疏漏，料將難免，敬希讀者不吝指正。

本書之整理，由何澤恆先生、張蓓蓓女士負責。

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

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：

一、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，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，對其本國已往歷史，

應該略有所知。

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，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。

二、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

意。

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，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。

三、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，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

偏激的虛無主義，

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，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。

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

史最高之頂點，

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。

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，一切諉卸於古人。

此乃一種

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謔。

四、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，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

希望。

否則其所改進，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，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。換言之，此種改進，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，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，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。

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

引 論

一

中國爲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，舉其特點有三。一者「悠久」。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。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，約得三千七百餘年。夏四七二，殷四九六，周武王至幽王三二五七，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。二者「無

間斷」。自周共和行政以下，明白有年可稽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，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一。自魯隱公元年以下，明白有月

日可詳。春秋編年從此始，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。魯哀公卒，左傳終，中間六十五年。史文稍殘缺。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賁治通鑑託始，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。三者「詳密」。此指史書體

裁言。要別有三：一曰編年，此本春秋。二曰紀傳，此稱正史，本史記。三曰紀事本末。此本尚書。其他不勝備舉。可看四庫

書目史部之分類。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，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，因此益形成其繁富。若一民族文化之評

價，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，則我華夏文化，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。

然中國最近，乃爲其國民最缺乏國史智識之國家。何言之？「歷史智識」與「歷史材料」不同。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，是爲歷史。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，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，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智識。材料累積而愈多，智識則與時以俱新。歷史智識，隨時變遷，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，有親切之聯絡。歷史智識，貴能鑒古而知今。至於歷史材料，則爲前人所記錄，前人不知後事，故其所記，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。然後人欲求歷史智識，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。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，則所謂「史」者非史，而所謂「識」者無識，生乎今而臆古，無當於「鑒於古而知今」之任也。

今人率言「革新」，然革新固當知舊。不識病象，何施刀藥？僅爲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，蠻幹強爲，求其實現，鹵莽滅裂，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。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，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。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，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，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。故所貴於歷史智識者，又不僅於鑒古而知今，乃將爲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也。

且人類常情，必先「認識」乃生「情感」。人最親者父母，其次兄弟、夫婦乃至朋友。凡其所愛，必其所知。人惟爲其所愛而奮鬥犧牲。人亦惟愛其所崇重，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。

求人之敬事上帝，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，不啻當面覲體焉，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爲上帝者，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。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。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，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，此其異耳。人之父母，不必爲世界最崇高之人物；人之所愛，不必爲世界最美之典型，而無害其爲父母，爲所愛者。惟知之深，故愛之切。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，此必爲無文化之民族。此民族中之分子，對其民族，必無甚深之愛，必不能爲其民族眞奮鬥而犧牲，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。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，以爲無足重視；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，懵無所知，而猶空呼愛國。此其爲愛，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，如農人之愛其牛。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，彼豈復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！凡今之斷脰決胸而不顧，以效死於前敵者，彼則尙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，有其一段眞誠之深愛；彼固以爲我神州華裔之生存息於天壤之間，實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。

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，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。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眞實之改進，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眞實之了解。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智識，其要在此。

二

略論中國近世史學，可分三派述之。一曰傳統派，亦可謂「記誦派」。二曰革新派，亦可謂「宣

派。亦可謂「考訂派」。「傳統派」主於記誦，熟諳典章制度，多識前言往行，亦間爲校勘輯補。此派乃承

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。其次曰「革新派」，則起於清之季世，爲有志功業，急於革新之士所提倡。最後曰「科學派」，乃承「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」之潮流而起。此

派與傳統派，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，路徑較近；博洽有所不逮，而精密時或過之。二派之治史，同於缺乏系統，無意義，乃純爲一種書本文字之學，與當身現實無預。無寧以「記誦」一派，猶因熟諳典章制度，多識前言往行，博洽史實，稍近人事；縱若無補於世，亦將有益於己。至「考訂派」則震於「科學方法」之美名，往往割裂史實，爲局部窄狹之追究。以活的人事，換爲死的材料。治史譬如治岩礦，治電力，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，亦於先民文化精神，漠然無所用其情。彼惟尙實證，夸創獲，號客觀，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，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。

惟「革新」一派，其治史爲有意義，能具系統，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，能求把握

全史，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。故革新派之治史，其言論意見，多能不脛而走，風靡全國。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，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。雖然，「革新派」之於史也，急於求智識，而怠於問材料。其甚者，對於二、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，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，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，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。因此其於史，既不能如「記誦派」所知之廣，亦不能如「考訂派」所獲之精。彼於史實，往往一無所知。彼之所謂系統，不啻爲空中之樓閣。彼治史之意義，轉成無意義。彼之把握全史，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。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，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，而非有外在之根據。其結合歷史於現實也，特借歷史口號爲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。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智識中，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案。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智識者，智識既不真，事功亦有限。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，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，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，乃最爲無識也。

三

所謂「革新派」之史學，亦隨時遞變。約言之，亦可分爲三期。其先當前清末葉。當時，有

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，厥在「政體」。故彼輩論史，則曰：「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，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。」彼輩謂：「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。」彼輩於一切史實，皆以「專制黑暗」一語抹殺。彼輩對當前病證，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。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，則此等議論，亦功成身退，爲明日之黃花矣。繼「政治革命」而起者，有「文化革命」。彼輩之目光，漸從「政治」轉移而及「學術思想」，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，亦轉集於「學術思想」之一途。故彼輩論史，則曰：「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，思想停滯無進步，而一切事態，因亦相隨停滯不進。」彼輩或則謂：「二千年來思想，皆爲孔學所掩脅。」或則謂：「二千年來思想，皆爲老學所麻醉。」故或則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，或則歸罪於老子。或謂：「二千年來思想界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。」或則謂：「此二千年來之思想，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『中古時期』。要之如一丘之貉，非現代之所需。」或則謂：「思想限制於文字，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痾積痺，莫如並廢文字，創爲羅馬拼音，庶乎有瘳。」然待此等宣傳成功，則此等見識，亦將爲良弓之藏。繼「文化革命」而起者，有「經濟革命」。彼輩謂：「無論『政治』與『學術』，其後面常爲『社會形態』所規定。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、學術內容，其先應從事於『社會經濟形態』之改造。」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，影響及於論史，則曰：「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，皆一『封